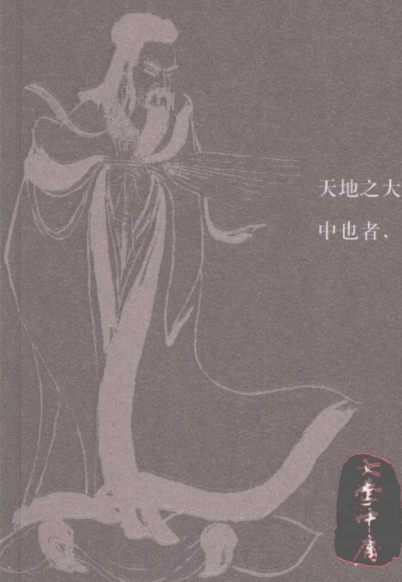


国学经典释读丛书

大学中庸

通说



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邓球柏◎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释读丛书

邓球柏◎著

大学中庸
通说



大学中庸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中庸通说 / 邓球柏著. —2 版.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5438 - 5277 - 8

I. 大... II. 邓... III. ①儒家②大学 - 研究③中庸 - 研究
IV. B222.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6270 号

大学中庸通说

作 者: 邓球柏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雄伟 莫金莲 李 茜

装 帧 设 计: 杨 震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健峰彩印实业有限公司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12.5

字 数: 185000

印 数: 1 - 5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5277 - 8

定 价: 24.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序

邓球柏先生著的《四书通说》就要与读者见面了。球柏先生嘱咐我为之作序，实在勉为其难，凭球柏先生的学术地位和水平，我还不够作序的资格。但作为同窗好友，恭敬不如从命，只好硬着头皮，从叙叙旧的角度勉强为之。

我与球柏先生是大学同学，同寝室，上下床，一起度过了四年时光。毕业后，我们又一道留校任教。我调离高等学校后，球柏先生却一直任教于高等学校，尽管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他从湖南走到了北京。

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跨进大学校门的学生，四年的学习生活是回味无穷的。同班同学，然而年龄相去甚远。人生阅历不同，导致志趣各异，各自对未来有着不同的追求。有的憧憬着从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的盼望着教书育人，从教数十年，桃李遍天下；有的期待着学术研究，在祖国学术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也有的在观望等待，服从祖国的分配。尽管各自的志趣不同，但总的目标是共同的，这就是振兴中华！

我和球柏先生走进大学校门时，年龄似乎都偏大了一点。现在的大学生走出校门时，还不到我们那时走进大学校门时的年龄。我与球柏先生又有着相同的经历：都出生于农村，且都是比较贫困的农村；我们都上过师范学校，教过书，对教书育人有着共同的感情。因而我与球柏先生志趣比较相投，共同语言比较多。我们都把毕业后的工作目标定位于教书育人，同时搞点学术研究。高等学校本来就是教学、科研一起抓，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促教学。高等学校教师走着一条学者的路。我和球柏先生都选择了学者的道路。

然而，学者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学者的道路上，需要勇气，需要毅力，需要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远远不及球柏先生。球柏先生在大学时代就表现出了一种对学术研究的孜孜不倦的执著追求，他也曾给我诸多教诲，诸多勉励，诸多鼓劲，然而我却在学者的道路上止步不前，而球柏先生在学者的道路上不断迈向新的台阶。借此机会，我真诚地祝贺球柏先生取得的学术成就！

球柏先生在学术方面的成就，首先当属对周易的研究。他对周易的研究，

大学中庸

通说



序一

起步于大学二年级时。记得那个时候，他废寝忘食地阅读周易及有关周易研究方面的著作，学校图书馆和老师家里有关这方面的书，他都尽可能地借阅了，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我用“废寝忘食”四个字来形容他当时阅读周易及有关周易研究方面的著作的情景，一点也不夸张。他常常通宵达旦地阅读，不知有多少次，当我们早晨从床上醒来，而他却才从教室里归来。并且熬了一个通宵的他，也不是人们通常所看到的一些人那么疲惫不堪，他精神振作得很。他毕业后不久写出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帛书周易校释》得到周易学界的充分肯定后，我似乎理解了他当时精神那么振奋的原因：他完全陶醉在对周易的学习和研究中。他对周易研究的执著追求取得了喜人的成就，继《帛书周易校释》出版后，又相继出版了《周易的智慧》、《白话易经》、《白话帛书周易》、《白话焦氏易林》、《论语通解》、《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等几部著作。现在，球柏先生又撰成《四书通说》。“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论语》一书记录了孔子关于怎样做人、做事，怎样求官、做官，怎样忠君，怎样爱民、保民、亲民、仁民、富民、育民、福民的宝贵经验和教导。宋朝著名宰相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流芳百世。毛泽东也熟读《论语》，他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读《论语》，一读就是六年。”《论语》被当作“东方人的圣经”广为传播。《论语》所体现的儒家伦理在东南亚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论语》被日本工商界奉为《圣经》。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著有《论语加算盘》，提倡道德经济合一论。

《大学》经文205字，相传是孔子归纳总结出来的帝王之道，由孔子的弟子曾子记录下来。由曾子进行阐发传授的《大学》传文1546字，经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与经文合璧流传于世，被收入《礼记》之中。《大学》揭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谛，可以视为我国最早广泛流行的官箴。

《中庸》相传是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子思所作，是对孔子仁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提倡至诚尽性与天地人和平相传，其“至诚如神”的训导为孙中山所服膺，其对“仁智勇三达德”的阐述为尼克松所赞美（尼克松认为大政治家必须具备三大条件：一个好脑袋[智]、一个好心肠[仁]、一种好精神善于决断[勇]），其对“五达道”的阐释对于我们今天提倡的思想道德建设也不无启示作用。《中庸》被收入《礼记》之中。

《孟子》一书相传是由孟子和他的弟子共同编订的，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本

人。相传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得圣人之真传。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生追求保民而王发政施仁的理想政治。《孟子》一书系统地阐明了孔孟的仁民政治，是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帝王之道的总结。孟子生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转型的战国时期，他目睹战火下人民的悲惨生活，立志救民于水火，游说诸侯保民而王、发政施仁、尊德乐义；呼唤和平，呼唤停止战争，呼唤祖国统一，但却不见用于世。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遵孔子之道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孟子》一书凝聚了孟子的伟大理想和抱负，以及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是爱民的宝典。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宋代以《孟子》升经，又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淳熙间（1174—1189），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此后，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四书》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其在宋以前就已受到程度不同的重视。

秦始皇晚年焚书坑儒，导致国家分裂，生灵涂炭。汉高祖纳谏改过，崇奉儒学，天下太平。汉文帝慈惠爱民，专务以德化民，与民休养生息，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为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汉景帝移风易俗，黎民纯厚。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以便自己能担当“任大而守重”的帝王之业，因而以对策的方式举贤良求治道，接受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文帝开皇三年（583），诏令天下劝学行礼。唐高祖、唐太宗鼓励尊孔读经，以至于出现了唐代初年的“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儒林传序》）的盛况。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标准，唐太宗还下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撰立《五经正义》。李世民倡孔子正身修身之德，创盛唐贞观之治。

隋唐科举取士，以儒学为主。唐代明经习经，《大学》、《中庸》所在的《礼记》冠群经之首，为两部大经之一；《论语》为必习之书。《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记唐选举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中明确规定：“凡正经有九：《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穀梁春秋》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老子》并须兼习。”

诚然，尊孔读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却是极为重要的。无怪乎柳诒徵大声疾呼：“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

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1988年1月，法国巴黎75位国际诺贝尔得奖人的会议宣言强调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这就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文化将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担当起重要的责任。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四书》。因此，用现代人的意识，用未来眼光诠释《四书》的历史使命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肩上。

球柏先生勇敢地挑起了诠释《四书》的重任，历十年之久，殚精竭虑，撰成《四书通说》。《四书通说》的最大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综合百家，注入现代意识，解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显微阐幽，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创意迭出。兹举二三，荐诸读者。

（一）大学之道与管理哲学

在我国古代，“《大学》受到了知识分子尤其是做官的知识分子的特别青睐。《大学》不仅被誉为圣贤之学奉为圣学经典，而且被尊为帝王之学、视为帝王将相的教科书。用现代意识来解构《大学》，我们不但可以将《大学》视为管理哲学、领导哲学，而且可以将《大学》视为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大纲”（《大学通说·序》）。

“若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大学》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哲学理论，甚至可以说，大学之道便是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大学通说·序》）。

我们知道，大学之道主要由“三纲领”与“八条目”组成。

球柏先生认为，“三纲领”阐明了管理的本质和价值。“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既体现了管理的本质，又体现了管理的目标和价值。追求美德是管理人员的本质要求。平天下的实质是明明德于天下，让天下人都达到至善的境界。亲民、新民、爱民，是管理者的美德的外化。“明德、亲民、至善，既是管理的本质要求，又是管理的价值取向标准。一个高素质的管理者必须具备这些本质要求”（《大学通说·序》）。

球柏先生认为，“八条目”既阐明了管理的任务，又阐明了管理的价值。他说，《大学》提出的管理任务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价值就在于实现“三纲领”，完成“八条目”，“即达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

一人生理想境界。具体地说，格物、致知、诚意的价值即在于追求管理者的真；正心、修身的价值即在于追求管理者的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即在于追求管理目标的实现（美）”。“‘八条目’的实施过程就是管理过程中的真善美的完善过程。即是‘明明德’于自我、‘明明德’于家庭、‘明明德’于国内、‘明明德’于天下的逻辑展开和历史进程，又是‘亲民’、‘止于至善’在管理过程中的充分体现”（《大学通说·序》）。

球柏先生对《大学》的这些见解，发前人未发之覆，睹今人未睹之秘，融会古今，沟通中外，嘉惠士林。

（二）中庸之道与“三德”建设

什么是中庸之道？球柏先生廓清了以往对中庸之道的种种误解，作出了中庸之道就是和平之道、诚实之道、忠恕之道的科学诠释。他认为，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中庸之道包括主题思想、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原则、检验标准、知行方法、重要途径等丰富内容。例如，他说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

球柏先生从七个方面阐述了什么是中庸之道。我们透过球柏先生的阐述，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庸之道在培养提高人的素质，加强人的基本道德修养，加强人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完善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讲中庸之道，促进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建设，是球柏先生赋予中庸之道的现代意义。他说：“中庸之道的合理成分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建设。我们可以在全社会宣讲达道提倡亲亲以促进家庭美德建设，宣讲达德提倡尊贤以促进职业道德建设，宣讲修身提倡慎独以促进社会公德建设。用至诚的精神以美士风、家风、民风、世风。”（《中庸通说·序》）

（三）孔孟之道与天下和平

孔孟之道与天下和平这一主题贯穿于《四书通说》的始终。球柏先生认为，孔孟之道的实质就是亲亲忠君尊贤爱民向往天下和平，因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就是培养既会做人又会干事的大政治家。大政治家需要集仁、智、勇三者于一身。球柏先生在阐述《论语·宪问》第二十九章孔子说的“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时指出：

大学中庸

通说



序

“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具备仁、智、勇三种素质。那么什么是仁的表现呢？什么是智的表现呢？什么是勇的表现呢？孔子在这里给仁、智、勇予以了界定。这是研究孔子仁学、智学、勇学的重要内容。孔子谦虚自责（我无能焉），旨在勉人上进。成德以仁为本，进学以智为阶，成事以勇为帅。此三者是铸就理想人格，造就伟人缺一不可的重要因素。”

又如《论语·宪问》第三十六章：“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球柏先生阐述道：

“孔子为世人不理解他而大发感慨，悲伤不已。子贡直言不讳地向孔子提问为什么没有人理解他。孔子从他的精神境界、处世态度、学习方法和目的的特殊性回答了为什么没有人理解他的原因。孔子的精神境界是不怨天，处世态度是不尤人，学习方法是下学于人事，学习目的是上达于圣道。这三个方面在孔子看来是旁人所没有达到的，也是人们不可能深刻认识得到的。因此孔子感到自己没有知心朋友。”

又如球柏先生在阐释《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时指出：

“在人际交往中，不免有矛盾。当矛盾产生的时候，多从自身检查矛盾产生的原因，少归咎于别人，矛盾就会迎刃而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就是解决人际交往矛盾的有效方法。这也就是‘礼之用，和为贵’的具体运用。”

在阐述《孟子·公孙丑上》第四章“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时，球柏先生写道：“这一章揭示了孟子的荣辱观、祸福观以及孟子的价值取向尺度。孟子认为，施仁则荣，不仁则辱；施仁则福，不仁作孽则祸。全章论述了‘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这一论点。告诫君王及时修德施仁，趋利避害，趋福避祸，造福人民。”

孔子的思想侧重忠君，孟子的思想侧重爱民。球柏先生在阐明孟子的“民贵君轻”著名论断时指出：

“民贵君轻，是孟子政治观的核心内容。孟子认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对民贵君轻的政治观教育。要求君王发政施仁以民为本，保民而王尊重人民。他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观教育主要是针对君王提出来的，是对上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告诫君王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尊重人民。另一方面孟子又鼓励君王和人民在精神上学习尧舜的品德，达到尧舜的精神境界。

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观教育告诫君王要得民心、得民助。因此，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离娄下》）所以他特别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重要作用。

孟子为了阐明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引《太誓》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证成其说。根据《太誓》的文字和孟子的理解，我们似乎可以推导出以下贵民的命题：

天意自我民意；天心自我民心；

天志自我民志；天喜自我民喜；

天怒自我民怒；天哀自我民哀；

天恨自我民恨；天恕自我民恕；

天怨自我民怨；天成自我民成。

直言之，上天尚且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何况于君王乎？焉能不与民同乐哉！焉能不尊重人民，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哉！只有尊重人民，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发政施仁，保民而王，才能达到天下和平的幸福境界。这就是球柏先生所提倡的孔孟之道。

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否符合球柏先生的原意，恳请读者评说。

是为序。

李建国

2008年3月31日

于长沙望月村

大学中庸
通说

序



序二

《大学》原来只是《礼记》49篇中的一篇，共1751字。在韩愈、李翱以前，《大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韩愈、李翱才开始将《大学》《中庸》看成与《论语》《孟子》一样重要的书。经过宋朝的司马光作《大学广义》，再经过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大力推崇，《大学》受到了知识分子尤其是做官的知识分子的特别青睐。《大学》不仅被誉为圣贤之学奉为圣学经典，而且被尊为帝王之学、视为帝王将相的教科书。

用现代意识来解构《大学》，我们不但可以将《大学》视为管理哲学、领导哲学，而且可以将《大学》视为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大纲。因而我们便可以说，“三纲领”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纲领，“八条目”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措施和主要内容，“修身”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

更准确地说，《大学》是我国古代大学的教育路线和方针。这条教育路线以品德教育为核心。这个教育方针包括教育纲领、教育目标、教育任务、教育原则、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措施和途径等内容，旨在培养合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才。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大学》，我们便可以撰写一部《大学之道与管理哲学》的大书。《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大学》当然也是讲礼仪的，不过，若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大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哲学理论，甚至可以说大学之道便是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我们今天所说的管理哲学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管理学家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提出来的。他指出：“科学管理包括着某种主要的普遍原则，是一种能以各种方法运用的哲学观。”

管理哲学是在1978年诞生的。1978年，加拿大学者克里斯托弗·霍金森出版了《管理哲学》一书，他把哲学看成是管理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管理的核心。

管理哲学主要研究管理的本质、管理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管理中的方

方法论问题以及管理中的真、善、美问题。

管理作为人类的一项重要活动，不仅需要从社会学角度加以认识，而且要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管理活动存在于物质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活动、社会政治活动中。它依附于各种人类活动，存在于各种活动的始终。它协调个人的活动，使总体协调地运动。这就是管理的本质。

管理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管理主体是管理活动的主要因素，它是指拥有相应权力、具有一定管理知识、从事管理的人。管理客体是指进入管理主体活动领域的人或物，主要有人、财、物三种形式。

管理方法是管理主体进行管理活动使用的手段和工具。

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必须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运用真、善、美来考察管理活动。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管理主体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也就具有更多的道德义务。如果管理者对事业极端负责，对属下十分关心，不以权谋私，不任人唯亲，这就是善。如果管理者贪污受贿，官僚主义，武断专横，那便是恶。管理哲学要研究管理者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管理哲学也研究管理活动中的审美问题，研究如何在管理中发挥美的魅力。例如，如何使管理者的心灵、行为更美些，如何在人际交往中实现人情美、在管理中创造美的环境、生产美的产品，等等。这是当今的管理哲学理论。而在我国，古代的大学之道早就程度不同地探讨了上述管理哲学的问题。

大学之道就是《大学》中的“三纲领”和“八条目”。具体内容如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纲领”阐明了管理的本质和价值。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既体现了管理本质，又体现了管理目标和价值。管理主体必须对自己提出较高的道德要求。首先，就必须“明

明德”。“明明德”就是要发扬光大美好的品德。前一个“明”字是动词，解释为彰明、发扬光大。后一个“明”字是“德”字的形容词，解释为美好的、光明的。所以《大学》传文阐述说：“《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要求管理人员朝着“明明德”这一理想人格前进。《康诰》是《周书》的一篇。“克明德”，意思是说能够达到美德。克，训释为“能够”。《大甲》是《商书》的一篇。“顾谟天之明命”。意思是说，坚持不懈地发扬光大美好的品德是管理者的天职。顾，是坚持不懈的意思。谟，古“是”字，训为“此”，指代“明明德”。“天之明命”，朱熹解释说：“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我们在这里将其理解为“管理者的天职”。也就是说追求美德是管理人员的本质要求。平天下的实质是明明德于天下，让天下人都止于至善。

《帝典》即《尧典》，是《虞书》的一篇。“克明峻德”，意思是说，能够发扬光大美德、大德。克，能。峻，大。峻，《书》作“俊”。

传文引《康诰》的“克明德”讲的是管理主体能“明明德”的可能性；引《帝典》的“克明峻德”讲的是管理主体“明明德”的现实性；引《大甲》的“顾谟天之明命”讲的是管理主体能“明明德”的必然性；“皆自明也”指出了管理主体的“明明德”的自觉性。《大学》传文从可能性、必然性、现实性和自觉性四个方面论证了大学之道的在明明德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以便提高管理人员进行品德修养，追求美好品德的自觉性。因此，管理人员必须懂得“在明明德”的重要性。

其次，管理人员必须懂得“亲民”的重要性。只有亲民才能教育管理人民。

《大学》中“亲民”的“亲”字有四层含义。第一，“亲”具有“仁爱”的意思。《说文解字》：“仁，亲也。”亲民，就是仁爱人民。《孟子·滕文公上》：“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赵岐《注》：“亲，爱也。”《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亲亲，爱亲也。仁民，爱民也。因此，亲民，就是仁爱人民的意思。第二，“亲”具有“和睦”的意思。亲民，就是与人民和睦相处。《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孔颖达疏：“睦即亲也。”故知“亲民”具有与人民和睦相处的意思。第三，“亲”具有“亲近”、“亲密”、“接近”等含义。《周易·文言传》：“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孔颖达疏：“《大司徒》云‘动物植物’，本受气于天者是动物，含灵之属，天体运动，含灵之属亦运动，是亲附于上也；本受气于地者是植物，无识之属，地体凝滞，植物亦不移动，是亲

附于下也。”可见，“亲”有“亲密”、“亲近”等义。《说文解字》：“亲，至也。”第四，“亲”具有“新”的意思。朱熹《大学章句集注》：“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这个“新民”包含有教育人民的意思。不必改“亲”为“新”，自然也能引申出新民之义。“亲民”就必然爱民，爱民就能够同人民和睦相处，与人民和睦相处自然就能亲密无间，同人民亲密无间便能感化人民，教育人民，造就人民。因此，爱民、睦民、近民、新民四种含义都是“亲民”的题中之义。四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所以《大学》传文阐述道：“《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段传文从三个方面阐明了“在亲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求管理人员自觉地真诚地坚持天天洗心革面，像洗澡一样不懈地洗刷自己的污垢，让自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作新民”就是教育造就人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表明了管理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亲民、爱民，是管理者美德的外化。在古代，人民颂扬尧、舜爱民如子。《说苑·君道》中有详细记载。兹译两段于此：

河间献王说：“[过去] 尧对天下人关怀备至，特别关心穷苦人，悲痛万民遭受困苦，担忧众生不能事事顺遂。只要有一个人饥饿，他就说：‘这是我使他饥饿的。’只要有一个人犯罪，他就说：‘这是我使他陷入罪恶的。’仁慈昭著了，道义树立了，德泽丰厚了，教化广泛了，所以不用奖赏百姓互相劝勉做好事，不用惩罚百姓得以治理。先宽恕他们，后教导他们。这是尧治理天下的方法。”

在虞舜的时候，有苗氏不顺服。他们不顺服的原因，是太山在它的北边，衡山在它的南边，左边是洞庭湖，右边是鄱阳湖，凭借这样的险要地势，所以不顺服。大禹要讨伐有苗氏，虞舜没有允许，虞舜说：“教化还没有尽到力量。”因而便长久施行教化，有苗氏终于请求归顺。天下人听到这件事，都批评大禹的伐苗主张，向往虞舜的德政。

第三，管理人员必须懂得“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居于最美好、最完善的品德境界。“止于至善”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大学》传文指出：“《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

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侔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谄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侔兮者，恂慝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由此可见，明德、亲民、至善既是管理的本质要求，又是管理的价值取向标准。一个高素质的管理者必须具备这些本质要求。

同“三纲领”紧密相连的“八条目”既阐明了管理的任务，又阐述了管理的价值。管理的任务是什么呢？其任务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管理的价值是什么呢？其价值就在于实现“三纲领”，完成“八条目”。即达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人生理想境界。具体地说，格物、致知、诚意的价值即在于追求管理者的真；正心、修身的价值即在于追求管理者的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即在于追求管理目标的实现（美）。同时，我们又可以将“八条目”视为管理目标内化、外化的过程。

“格物”是管理者个人的道德实践，“致知”则是他们的个体道德认识。因此，郑康成注解：“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格”字有“来”“至”等义，“至”有“参与”“实践”等引申义。物，是事。所以说“格物”是个人的道德实践。只有积极参与道德实践，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认识。故曰“物格而后知至”。格物的具体活动就是事君、事臣、事父、事子、与国人交往。可见这既是管理的任务又是管理的本质，协调个人的活动，使总体协调地运动。在这些格物的过程中协调人际关系，提高管理者的道德认识水平，就是“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而后知至，是一个道德实践上升到道德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又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通过道德实践的感性认识，经过管理者的悟性认识上升到道德理性认识。这就涉及管理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管理者具备了道德的理性认识，便有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所以《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促使管理者进行道德自律，诚意不欺。因而传文解释“八条目”的“诚意”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

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这一段文字阐明了道德自觉性促进管理者达到道德自律境界的重要意义。诚意这一道德境界的标志是“毋自欺”，追求自我满足，自我完善（自谦，自慊，自娱、自乐、自足），强调“慎独”自律。

管理者有了道德自律意识，就能自觉地净化灵魂。能够自觉地净化心灵，就能美化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这就是修身。所以《大学》说“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传文阐述道：“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zhì），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正心是净化、美化心灵。修身是净化、美化、优化仪表行为。不能净化、美化、优化自己的心灵，就不能净化、美化、优化自己的仪表行为。净化、美化、优化自己心灵的方法是使自己的心灵平和，达到没有愤怒、没有恐惧、没有好乐、没有忧患的中和状态。如果心灵不能净化、美化、优化，就会出现“心不正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的浊化、丑化、劣化行为，就达不到修身的目的。诸葛亮的《诫子书》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云：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丞相集》，引自（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娄东张氏原刻本]

《大学》认为，只有自我修养完美的人才能治理好家庭，自我修养差的人就不能治理好家庭。《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传文阐述道：“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大学》传文将修身和齐家有机结合起来，认为身修、家齐的典范应该是“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要求管理人员不要片面看问题，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不应偏爱，对于自己所贱恶的人也不应偏恶，对于自己所畏敬的人不应偏敬，对于自己所哀矜的人不应偏矜，对于自己所傲惰的人不要偏傲。也就是要全面看问题，公平、公正待人。

齐家与治国紧密相关。《大学》强调“家齐而后国治”。传文阐述道：

大学中庸

通说



序二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大学》认为，国是放大的家，能在家中整齐家政就能够出而治国。如果不修身，就不能治理好家庭，就不能教化好子女，因而也就无法教化国人。所以要求国中的管理者成为修身、齐家的优秀典范。大凡在家能够孝顺父母的人，在国中便能忠诚事上；在家能够尊敬兄长，在国就能敬顺长辈；在家能够慈爱子女，在国就能慈爱抚恤人民。《大学》传文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旁征博引，说：“《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治国与平天下息息相关，平天下的基础在于治国。故《大学》说：“治国而后天下平。”传文阐述道：“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这里的絜矩之道就是平天下之道。平天下要用自己的行为规范来感化天下万民。要用爱心去关心人民，爱护人民。因而《大学》传文说：“《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同时《大学》传文还进一步阐明了管理的方法和措施，这就是《大学》的方法论原则：絜矩之道。絜矩既有衡量比较的意义，又有将心比心的换位思维因素。

絜矩之道的方法论原则是：“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这一方法论原则又凝聚了管理价值。

絜矩之道的督促检查体验方法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絜矩之道的具体措施是：“能爱人，能恶人。”见贤则能举，举之则能先；见不善则能退，退之则能远。“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